在文明互鉴中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

黄　海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 国家治理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 长沙 410003)

摘　要: 西方社会科学话语霸权的认识论、方法论根源为隐性但顽固的欧洲中心论,在政治领域表现为契约国家、抽象票决民主、个人自由主义至上等话语和文化特征,在经济领域表现为以私有产权为经济发展前提、以赋权参与为脱贫前提等话语和文化特征。基于文明互鉴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必须直面西方话语霸权核心议题,以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成果为主体内容,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宝贵资源,以西方社会科学积极成果为有益滋养,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

关键词: 文化自觉;文明互鉴;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

中图分类号: C 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919(2021)06-0012-07

一、问题的提出

从知识生产科学化的角度来看,讲究理据,有理不在声高,毋庸置疑应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原则。如此说,当然并不是指它与人文研究相比,完全可以撇除研究者的主体体验,而是指社会科学知识产出的逻辑论证效力,不应因研究者在现实世界中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位置不同,即有可以颠倒黑白的差别。然而,从现代社会科学在世界格局中的话语呈现形式看,西方话语在不少“场域”①中正是靠着“声高”,而装扮得俨然天然“有理”。究其本质,这即是一种话语上的“文化霸权”。如其常对西方数百年殖民杀戮视而不见,却善于精心虚构证据,指责他国人权;夸赞其人均碳消耗量位列世界前茅的国家环保,而指责其他超大规模人口国家的碳排放总量。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可见社会科学知识生产领域中的西方话语霸权,是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

由此,基于文化自觉的社会科学话语建构,对于任何社会本土经验的解释和其问题的解决,就有着极端重要的意义。文化自觉,费孝通指出,乃是人们对自己所拥有的文化有“自知之明”,“自知自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时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②。社会科学话语建构必须有文化自觉,并不是指每一个国家、每一种文化都建立起一套标准独特的社会科学体系,而是在揭示、抵制西方话语霸权的意义上,形成符合社会科学“言之成理”标准而又有利于实现其平等话语权的表述体系。

2011 年,我国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提升到了一个新高度。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必须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③。在 2013 年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

收稿日期: 2021-07-10

作者简介: 黄海,男,湖南平江人,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国家治理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

① 皮埃尔·布迪厄、华康德布:《实践与反思》,李猛、李康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33—134 页。

② 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第 14 卷,北京:群言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66 页。

③《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2011 年 10 月 26 日第 1 版。

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加强话语体系建设,增强国际话语权。在2016年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他再次强调了这一点。

在此背景下,我国学界也加强了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研究,并取得了较大进展。在原则上,郑杭生等人指出既要借鉴西方又要“跳出”西方,并对其进行“再评判”①。在内容上,杜飞进认为,中国特色话语包括核心层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理论的中间层,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生产、生活语言的外围层②;陈曙光等认为,中国话语的实质是中国道路的理论表达③。关于如何构建中国特色话语,骆郁廷等认为,需用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理论言语和实践话语,深刻解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认同、理论认同和制度认同④;陈金龙指出,关键在于处理好“中、西、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自觉传承与创新中国传统文化,自觉吸收与借鉴西方文化,自觉坚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⑤;金永兵指出,关键词研究为从方法论或元理论的意义上探寻话语体系建设提供了可能性⑥,等等。

我国学界现有关于中国特色社会科学话语的研究,对其应包含的基本内涵以及建构原则和方法,已取得了一定的积累。尤其是在如何处理中国传统、西学及其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方面,其中不乏深刻的洞见。但从习近平总书记所提的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⑦和解决新时代下实践问题的要求来看,则还不乏亟待继续深入研究的问题。例如,从具体内容上来说,社会科学研究中的西方话语霸权究竟在哪些核心命题上表现得格外牢固,新时代世界格局变动为人们“再评判”这些命题到底形成了何种条件,在这些条件下可尝试从哪些方面突破去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

二、西方社会科学话语霸权的认识论与方法论根源

首先,在社会科学认识论及其方法论领域,隐性但顽固的欧洲中心主义依然倾向于将非西方文化“去主体化”“本质化”。

西方社会科学是在内部工业革命、资本主义兴起,以及对外殖民的时代背景下兴起的。因此,在对待非西方社会的问题上,西方社会科学一开始就具有强烈的将殖民活动合法化的冲动。一方面,它“取经”于达尔文,用社会进化论的思想,将人类社会进行文明排序将自身置于文明的顶端,致力于用其文明照亮所谓“蒙昧”“野蛮”“半文明”的“黑暗”;另一方面,它也积极研究殖民地人们的社会组织,努力探索非西方社会的运作逻辑,为殖民统治提供政策支持。要实现这样的目的,成功地将非西方文化转化为“野蛮人”和“原始人”,西方社会科学使用了一种“异时化”的策略,即把非西方文化置于其他的时间序列中。所谓的“野蛮人”或“原始人”,被想象成是没有文明的原始文化的产物,处在另类时间内的原始社会和野蛮人成为证明西方文化先进的绝佳例证⑧。

主要由西方国家争霸导致的两次世界大战制造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深重灾难,引起了部分西方社会科学研究的反思。但是,欧洲中心主义的问题并没有得到彻底清算。例如,在反思以往社会科学中存在的欧洲中心主义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社会科学取得最为重要却不乏争议的贡献之一,是提出了文化相对论。它主张,每一种文化都有其独创性和价值,且这种价值只能被纳入其自身文化系统而不应

---

① 郑杭生:《把握学术话语权是学术话语体系建设的关键》,《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1月17日第B2版。
② 杜飞进:《积极构建中国特色话语体系》,《光明日报》2012年10月30日第1版。
③ 陈曙光:《中国话语与话语中国》,《教学与研究》2015年第10期,第23—30页。
④ 骆郁廷:《论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话语创新》,《江汉论坛》2014年第8期,第5—11页。
⑤ 陈金龙:《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权的建构》,《思想理论教育》2015年第3期,第8—12页。
⑥ 金永兵:《关键词研究与马克思主义文论话语体系建设》,《求索》2019年第4期,第52—57页。
⑦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0页。
⑧ 约翰尼斯·费边:《时间与他者》,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46—47页。

被放在欧洲标准下来进行评价。然而,当这种认识论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常常会引发出文化本质化的倾向,即把文化看作本体论意义上的存在,每种文化与其他文化之间有本质差别,相互之间无法理解。

一旦将文化当成了本体论意义上具有本质特征的东西,实际上也就将之变成了一种“种族化”的存在。这种将文化进行本质主义处理的认识论及其方法论,将文化之间的关系看成是隔绝的,使所谓的文化相对论变成了“种族中心主义一种新的、怪诞的表现形式”①。在这样的情况下,西方社会科学对非西方社会的研究,也就难免会出现过度诠释或“自以为是”诠释的倾向。这种认识论及其方法论带来的后果是,不仅其社会科学研究的客观性和科学性受到了根本侵蚀,实际上也否定了人类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存在超越各民族文化限制,而平等地相互认识的可能性。

再往深处探究,将文化本质化还为种族主义留下了暴力泛滥的“后门”。在全球化中处在世界政治、经济资源配置顶端的美国,也不乏保守主义者基于文化本质主义认识论,追问“我们(美国人)是谁?”②,甚至将文明差异视为新时代世界冲突的根源③。而近年欧美白人中的民粹主义者、保守主义者发起一系列针对其他族群的暴力袭击,以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社会冲突和政治事件,无疑表明西方社会科学中将非西方文化“去主体化”“本质化”的认识论及其分析问题的方法论,仍具有根深蒂固的影响。

其次,面对原本有普遍、辩证联系的人类及其与自然的共同体,霸权、单边孤立和干涉主义,以及以“人与自然”二分为前提的极端环保主义,仍如“幽灵”般存在。

当今世界不仅人与人之间联系日益紧密,不可能再回到“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状态,人与自然如何更好地融合也变成了一个尖锐的问题。作为一个“命运共同体”,人类无一例外地需要直接面对气候变化、生态安全等问题。然而,即使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及其社会科学界仍不愿抛弃其霸权主义、单边孤立主义和干涉主义。西方国家不仅在政治上以其强大的军事、经济、科技和文化力量为基础,干涉别国内政,对他国进行制裁、封锁、渗透,甚至直接侵略他国,而且其强大的社会科学研究力量还以所谓的“人权高于主权论”“主权有限论”“道德贸易”“捍卫人类普遍的价值观”等说辞,为其政治行为做“合理性”论证。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西方社会科学中深层潜藏的霸权主义同样十分强劲。从思想渊源上说,西方社会科学长期秉持人与自然、主观与客观二元对立的思想。它十分强调人与物、人与自然的区别和对立,而对彼此之间共同、共生、共荣的辩证统一关系,重视不足。其结果,正如帕斯莫尔指出,这种认识论将人当作自然的绝对“主人”④,一味强调人类至上、向大自然无限索取,造成了严重的生态问题。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又尤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核恐怖之下,西方社会科学界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日益重视生态环境保护问题。毫无疑问,这原本是一种具有积极意义的研究取向。然而,当其趋向激进之后,即带来了新的问题。在当代西方社会科学中,有相当一部分研究由原来的“天人二分”、征服自然的倾向,转向了另一个极端,即否定人的价值,否定非西方的发展中国家国民维持基本生存需要的、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权利。这种限制非西方人利用自然资源的权利的思想,实质上无疑是一种充满西方意识形态霸权的话语。

三、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应直面西方话语霸权核心议题

首先,在政治领域,西方社会科学以契约国家、个人主义自由至上的意识形态值得反思。

---

① Ernst Gellner. Postmodernism, Reason and Relig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p.60.

② 塞缪尔·亨廷顿:《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程克雄译,北京:新华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8 页。

③ 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修订版),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288—290 页。

④ John Passmore. Man's Responsibility for Nature. New York: Gerald Duckwort, 1974. p.28.

无可否认,社会契约论所产生的国家理论,以及由此派生出的抽象票决民主、个人主义自由以及民族“自治”等理论,在推动西方社会走出中世纪的过程中所起的、无可替代的作用。但必须指出,它的理论逻辑起点并非客观历史事实,而是基督教文明,当它们被去掉文化背景而被当作“普世”客观规律推向其他文明国家时,就只是一种西式意识形态,必定在其他文明国家水土不服。

西式自由的认识论以文艺复兴以来,也即社会契约论强调的个人主义为基础,它以个人为分析对象,并把对这一对象的分析结论用于解释其他一切政治现象并指导其政治实践。在这种思路下,由于主体的个体性,个人在知识和利益方面有一种局限,人为设计秩序(尤其是国家)只会是错误的,只有“自生自发秩序”①才是最好的,却似乎全然忘记了这可能是“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状态”。既然没有超脱或超越于个人目标之上的目标存在,就没有对个人目标加以限制的充分理由,否则,便会引起人类思想的停滞和理性的衰退。同样,西方现代民主是一种以国家与社会的分离为前提、以个体权利为核心价值的自由主义民主,确立了社会决定国家、国家服务于社会与个人的现代政治逻辑。但事实上,所谓的西式抽象票决民主、个人主义自由至上等,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亚非拉国家,并未如其所宣称的那样解决实际问题。

相反,中国共产党的百年辉煌历史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道路是历史的选择和人民的选择,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在政治领域的集中体现。民主是人类共有的价值,但不是西方民主一统天下,各国有权也必须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民主发展道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追求的不是形式民主,而是注重实际内容的真正民主,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②的人民真正当家作主。

其次,在经济领域,以西式抽象票决民主、私有制为经济发展前提,以赋权参与为有效脱贫前提的意识形态“神话”,亦值得警惕。

在非西方国家开展经济建设的过程中,在理论上需要面对的西方社会科学的一个意识形态“神话”,就是只有西式抽象票决民主、私有制才能促进经济发展。尽管这套意识形态在编织的过程中使用了大量精巧的数学模型,但其内核其实很简单,典型的概括就是:人类社会有两种政治制度,一种是西方的所谓“包容性”制度,如君主立宪和民主制,另外一种是非西方的“汲取性”制度,如专制和独裁③。在其话语体系和表述范式中,“包容性”的制度因为能够限制精英阶层的权力,意味着良好私有产权保护,人们从而有积累财富和发明创新的积极性,推动经济增长。而在所谓的“汲取性”制度下,由于没有很好的私有产权保护,人们缺乏积累财富和发明创新的积极性,以至于难以实现经济发展。反过来说,在这种视角下,解决贫穷的办法似乎也很简单,就是实现抽象平等的、一人一票的票决式民主选举。

然而,历史上诸多重要经济体的发展过程并不支持这样的理论和话语推演。例如,英国并不是在民主制度下崛起的。虽然它有过“光荣革命”带来的君主立宪,但它的私有产权保护力度并没有因为君主立宪而改变。德国和俄国在 19 世纪中期以后崛起,日本在 19 世纪末明治维新开始崛起,韩国、新加坡独立后经济起飞,都不是靠简单的票决民主制。当西方发达国家把票决民主制度强加给发展中国家时,这些国家也并没有因此而富强,反倒是内乱不断,如伊拉克、利比亚、阿富汗、埃及、乌克兰等,均陷入了“起火的世界”④。也正由此,事实上,“华盛顿共识”主张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简单的票决民主制,并不

---

① 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上),邓正来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7 年版,第 201 页。

②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 2021 年版,第 12 页。

③ 德隆·阿西莫格鲁、詹姆斯·A.罗宾逊:《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李增刚译,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55—56 页。

④ 蔡美儿:《起火的世界》,刘怀昭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12 页。

能自动解决中国农村的贫穷和粮食安全问题。在印度、非洲、拉美、东南亚和东欧,抽象票决民主化与私有化同样没能产生工业革命。

在发展援助和扶贫开发领域,西方社会科学话语也极为强调抽象票决权、民主赋权的参与式发展。因此,这些国家援助发展中国家的扶贫项目,往往附带一定的政治条件,如民主选举政治,教育、医疗卫生等政府公共开支最小化①。这种论调选择性地忘记了这样的事实:在拉丁美洲、非洲、东南亚和印度次大陆,西方发达国家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就一直在当地搞发展援助,培育 NGO 搞“民主”式参与式扶贫。如果以赋权、参与为核心的扶贫模式果真是“神药”,缘何这些地方至今依然满目疮痍? 由此,参与式扶贫固然在诸多技术环节上是有积极经验的,但将扶贫的出路简单归结为票决式民主“赋权”②,则显然是本末倒置。

相反,中国实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并不是用西方的所谓“民主政治”来对自己“削足适履”“亦步亦趋”。中国共产党始终注重从经济上实现和保障人民的物质利益。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土地革命的实实在在成果赢得民心。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一直努力带领中国人民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新道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走好“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强调不走僵化封闭的老路,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而是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中国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三者有机统一,用短短几十年时间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历程,走出了一条后发现代化国家后发赶超的中国道路,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减贫道路,“彰显了中国道路的基本价值立场,实现了中国道路发展手段与目标的有机统一,丰富了新时代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③ 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建构,理应直面西方话语霸权背后的核心命题,跳出西方社会科学背后隐藏的话语“窠臼”,这既是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必备的认知前提,也是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应有的文化自觉。

四、文化自觉与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的互构

当代西方社会科学虽然已经很少公然地宣称“欧洲中心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欧洲中心主义就消失了,相反,而是变得更为隐性化、精致化,同时也更加顽固。将非西方文化“去主体化”的西方意识形态话语霸权依然居高临下的以“拯救者”的姿态存在。这种认知的实质正如萨林斯所指出的,在很多时候,欧美研究者仍然只不过是在依照自己本土社会的世界观,对世界进行理解罢了,以至于所谓的从“他者”视角出发认识“他者”,实际上是一种欧美式“甜蜜的悲哀”④。应对这种话语霸权,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就必定离不开文化自觉基础之上的文明互鉴。具言之,既要充分认识当代社会科学话语中的西方话语霸权的实质是源于其偏颇的认识论及其方法论,并在政治、经济的核心议题上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偏见,又要从全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视角,以宽广的胸怀“吸收外来”的有益成果,坚持在文明互鉴中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

首先,针对西方社会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中潜藏的欧洲中心论,必须真正坚持和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成果,作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构建的主体内容,在破与立的关系上,科学处理好批判与建构的辩证关系。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的成果及其文化形态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主体内容,也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最大增量”⑤。在批判西方话语霸权中建构中国特色话

---

① 大卫·格雷伯:《债》,孙碳、董子云译,北京:中信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4 页。

② 约翰·弗里德曼:《再思贫困:赋权与公民权》,《国际社会科学杂志》1997 年第 2 期,第 5、9—20 页。

③ 赵中源:《以人民为中心:中国道路的价值坐标》,《求索》2020 年第 1 期,第 38—44 页。

④ 马歇尔·萨林斯:《甜蜜的悲哀》,王铭铭、胡宗泽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0 年版,第 67 页。

⑤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第 16 页。

语,尤其需要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形成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的理论框架,发掘和总结其在哲学社会科学上的认识论与方法论意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行动指南,其中蕴含的认识论与方法论,也应成为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认识论与方法论。

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构建,不能简单止步于对西方话语体系的批判,而是要在批判中以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建构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譬如,就文明形态而言,就要有足够的理论自信,充分阐释好中国共产党人对文明形态构建的独特贡献。百年辉煌党史充分力证,中国共产党人建构了一种人类文明的新形态,与西方物质文明畸形发展不同,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①。新时代"五位一体"战略布局和"五大文明"协调推进的伟大实践,呼唤伟大的理论创造。新时代理论工作者要增强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以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来完整呈现这一文明形态的丰富内涵。

其次,针对西方社会科学对非西方文化"去主体化"的西式话语,必须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宝贵资源,在古与今的关系上,科学处理好传统性和时代性的辩证关系。

西方社会科学几乎从不加反思奉为圭臬的抽象票决民主、个人主义自由,有其自身的文明基础和文化渊源。在其反封建主义的政治斗争历史中,这些话语在其自身历史和文化系统中有其意义。但是,在本质上,它们也是一种文明类型的"地方知识"②,而不是"普世"真理,更不能以此作为对其他"地方知识"的非西方文化进行"拯救"和"改造"的圭臬。

中国是一个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国家,在人类历史上创造了独具特色的中华文明。这里面,既有仁者爱人为政以德的儒家学说,又有无为而无不为的道家智慧,还有强调兼爱崇利的墨家思想,等等。这些思想是传统中国留给我们的宝贵思想财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十分宝贵、不可多得的资源"③,源远流长、深邃特色,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哲学智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主体人格意识下的积极入世、主体价值追求下的批判自省、主客体和谐关系下的大同情怀等哲学性格,深刻地凸显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独特的性格气节所在、精神魂魄所系,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是人类文明的生存智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我们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④。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需要深入研究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必然性、中华民族共同体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合理性、中国政治制度和运行的人民特性及其传统文化基础。有了此类扎实的社会科学研究,我们才可能从实在处着手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养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避免在西方优势话语下一些非西方文化"去主体化"的"文化悲剧",将传统与现代相结合进行具有自身特色的话语建构。

最后,针对西方社会科学中的一些有益成果,必须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在中与外的关系上,科学处理好民族性和世界性的辩证关系。

一方面,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构建,必须立足本来,但并不排斥外来。西方社会科学产生了很

---

①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第14页。

② 克利福德·格尔茨:《地方知识》,杨德睿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193页。

③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第16页。

④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第13页。

多积极成果,“可以成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有益滋养”①。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宝贵品质就是开放性和包容性,一切有用的知识体系和研究方法,都可以研究借鉴、为我所用。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提出的“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一道,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②,就是在坚持文明互鉴中构建中国话语体系的生动体现。

另一方面,在文明互鉴中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既不能忘了老祖宗,也不能失去科学判断力,更不能脱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动实践的立足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着本质的区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人民真正的当家作主,中国特色的扶贫理论与治理理论为众多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种新的发展思路和参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使得积贫积弱的新中国经过七十余年的发展,一跃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丰富、深刻而又充满智慧的中国道路,正是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必须始终牢牢立足的经验事实。

概言之,面对西方话语霸权,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文化自觉与中国特色话语属于互构关系。如何基于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实践的文化自觉,来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对于打破西方话语霸权和桎梏,改变中国话语的弱势处境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对于这一命题,明确既要借鉴西方又要“跳出”西方的原则,无疑是一种洞见。但是,从具体的实践理性而言,还必须进一步厘清西方话语霸权的认识论、方法论根源,及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核心命题上的话语表征,方能进行有针对性的突破,以争取更平等的话语权。以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成果为主体内容,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宝贵资源,以西方社会科学积极成果为有益滋养,正是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构建中国话语的要义所在。

Constructing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Civilizational Mutual Reference

Huang Hai

(*National Governance and Public Policy Research Center*, *Hunan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Changsha* 410003, *China*)

Abstract: The epistemological and methodological roots of the discourse hegemony of Western social sciences are implicit but stubborn Eurocentrism, which are manifested in such discoursal and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as contractual state, abstract voting democracy and the supremacy of individual liberalism in the political field, and are also manifested in such discoursal and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as taking private property rights as the premis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aking empowerment and participation as the premise of poverty alleviation in the economic field. To construct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on the basis of civilizational mutual reference, we must take Marxism and its Sinicized theoretical achievements as the subject content in the face of the core topic concerning Western discourse hegemony, take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as valuable resources, and take the positive achievements of Western social sciences as beneficial nourishment, so as to get rooted in the great practic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construct a discourse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hinese styles and Chinese manners.

Key words: cultural self-consciousness; civilizational mutual reference;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责任编辑　郭昌盛)

①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第 16 页。

②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第 16 页。